

(美) 鲍勃·伍德沃德 著
郑天雷 等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美国的秘密战争

美国的秘密战争

译者：郑天雷 陈伟双 马云飞

陆国瑛 程文峰 彭春艳

责任编辑 吴正纲

装帧设计 陈 如



200252190

(美) 鲍勃·伍德沃德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1	序 幕
10	第一章 新局长上任
26	第二章 任用与培养
41	第三章 谨慎行事
53	第四章 利比亚：目标和脆弱点
65	第五章 伊朗，事后剖析
84	第六章 周游列国，实地视察
94	第七章 推翻卡扎菲的计划
103	第八章 用武力谋求和平
124	第九章 黑色的九月
137	第十章 武装梦运计划

154	第十一章	卫星和雇佣军
172	第十二章	大使馆挨炸
187	第十三章	空袭失败
204	第十四章	入侵格林纳达
228	第十五章	渗透
251	第十六章	港口布雷
259	第十七章	定时炸弹——墨西哥
277	第十八章	去干不干净的事
293	第十九章	四年的重大成功
308	第二十章	先发制人的袭击
316	第二十一章	郁金香行动
336	第二十二章	军事演习“草原大火”
348	第二十三章	爱维·贝尔斯行动
356	第二十四章	代号“面纱”
369	第二十五章	影子国务卿的幻灭

序 幕

闹钟的铃声惊醒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斯坦菲尔德·特纳。他最恨早起，因此他把闹钟铃声拨在这天——1980年11月20日，星期四清晨迟得不能再迟的最后一分钟——7点。这一天，伊朗的52名美国人质已经使吉米·卡特政府一筹莫展。过一会，特纳将要向新当选的总统罗纳德·里根作简要的情况汇报。

特纳，这位已经退役的56岁四星上将，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从系统分析员、海军“思想家”、到罗兹学者，他的目光始终超越眼前，投向更高的目标。然而他又是一位感情丰富的男人。时下正值新旧上司权力移交时期，他陷入了重重的心理矛盾之中……

首先，他得考虑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把真实的内幕——新总统必须了解的潜在危险、紧急的行动和间谍技术——向总统汇报。这些留在桶底的原装货既没有泄漏到新闻界，也没有落入苏联间谍之手。在赢得里根的信任之前，这场汇报只能是面对面地在他们两人之间进行。那些政治食客在前两次简要报告会上纠缠不休，可能还会在今天的会议上故伎重演，特纳不能当着他们的面公布这些秘密。他要寻求机会向新总统解释的是一次最秘密的情报行动，它关系到一

百多条人命的生死存亡。

其次，特纳要把里根的注意力引入到广泛的哲学上的问题——间谍活动和秘密行动的机会及机遇。在这一点上，作为总统是能够作出正确抉择的，况且里根许诺过要重整美国的雄风。

特纳想把自己的观点灌输给里根。在前两次简要报告会上，里根表面上十分开明，而实际上却保守得很。他向特纳挥手示意他继续讲下去时，透出一股轻佻和一种做作的沟通，仿佛一场大灾，一则好莱坞的故事或是一段保守的教义便可把世界上的症结一棒打掉。这与特纳在卡特身上领略到的严肃、几乎是冷酷的严厉盘问真有天壤之别。特纳向里根坦露得越多，越益对他的基本思考能力产生怀疑，他在暗地里已把里根描绘成一个“愚蠢”的家伙。

最后特纳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前途问题。他想表明自己愿意继续留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甚至想表明这也是他的愿望。里根和共和党政纲指责卡特捆住了中央情报局的手脚，使它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谍报活动。共和党人论证说身为局长的特纳过度地响应卡特的人权运动，过份热衷于完美的、采取守势的和相当安全的最新卫星和电子窃听技术而不冒任何危险，他们把中央情报局冠之以“软弱无能”。特纳心想，如果新总统给他一次倾听的机会，他能够对此进行辩驳。他的情报局曾经执行过的某些任务会对罗纳德·里根的看法施以当头棒喝。

特纳迅速下楼去用早餐，餐桌边放有一份《华盛顿邮报》，报上说：“据悉凯西即将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一把抓过报纸，他可压根儿没有听说过这种人事安排。

这位“凯西”就是威廉·凯西，里根的67岁的竞选总管。特纳觉得这种选择纯属倒退，绝对错误。理查德·尼克松曾委任他的1968年竞选总管约翰·米切尔为司法部长。难道中央情报局变成本年度政治战的胜利纪念品了吗？

特纳往下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西为战略情报部——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工作。”特纳认为这是牵强附会，如同叫几位二次大战的老上将来指挥今天的海军一样。在特纳的印象中，这个“战略情报部”是张老手们布成的同党网，它的残余分子和它的影响仍然留在情报局内，给特纳设置了不少棘手的麻烦。这帮子人精明圆滑，高居要职，称兄道弟。一旦与白宫或者国会发生磨擦，这帮弟兄便会挺身而出、两肋插刀，在70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的大调查中，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些老东西之所以还能够存活着，是因为还需要他们。每个总统、每个中央情报局局长都需要忠心耿耿地专干肮脏勾当的密探。他们结成一个互不见面的俱乐部，齐心协力，劲头十足地进行秘密行动。这号人连领赏都是偷偷的，可是在这种环境里照样能飞黄腾达。在中央情报局中他们既是劲敌又是懦夫。这一位老兄显然是从木工堆里冒出来的。《邮报》声称，在二次大战的最后六个月里，凯西一直负责在德国战线后方布置间谍人员。这已是35年前的事了。

特纳希望他们至少能给他留一点面子，把他的卸任决定在公诸报端之前先通知他本人。也许这只是一只试放的汽球，一篇虚构的故事，属于胡言乱语。直至这次总统竞选，他才听说凯西这个人物。两个星期前，里根以当选总统的身份在首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将重返政坛，凯西参与

他的私人法律事务。

被免职的可能性愈加坚定了特纳的信念：是他率领中央情报局渡过了70年代中期的动乱时期，医治了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遗留下来的后患，冲出了黑暗，顶住了国会对中央情报局历史的刨根究底式的大调查：阴谋暗杀外国领导人；向容易上当的人提供危险的实验用致幻剂；贮存小批量的在总统禁令范围内的毒品；私下开拆他人邮件以及侦查美国的反越战人士等等。是他把中央情报局领出了牛仔时期，击退了他认为的是非不分、狭窄迷惘的隐密作风。经过改革，使情报局展现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作风。这种改革就是向国会情报委员会详尽通报情况，即使是最机密的行动也不例外。他的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是响当当的，是得到国会支持的。一旦这些行动赢得了各方面的理解，也就会得到里根以及美国人民的支持。特纳深信这一点。

在大选前一个月，特纳把自己反锁在家里一个星期，回避了所有日常工作，潜心撰写了前四年的述职报告，同时拟订了后四年的工作规划，这份注明1980年10月17日《中央情报局局长专阅》的长达七页的提要比绝密还绝密。“目标——”讲述了一个会叫当选总统和他的班子拍案惊奇的故事。是的，特纳在控制某些“牛仔”和“弟兄”的野性冲动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他终究赢得了控制并且撵跑了许多老手。然而现在出现了更为重大的问题，中央情报局绷紧了神经。抵触和怯懦往往是行动处的标志，作为谍报分部的该机构是指挥中央情报局在国外的谍报站和间谍行动的秘密执行管辖部门；一旦总统命令对外国的事务进行秘密干涉时还要负责执行这些秘密行动。

有许多次，特纳提出采取某些新的秘密行动的计划，但受到了该处的冷遇。例如有一次，他未向白宫请示便擅自给负责行动的副局长送去了一份用水显示的信函，询问如何行动才能够推翻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古巴的卡斯特罗、伊朗的霍梅尼和利比亚的卡扎菲，他们都给美国的全球利益造成了损害。来自负责行动的副局长的回答是：对不起，不行，这三个国家的任何一国都没有能维持下来的政治反对派；而中央情报局也未能充分了解该支持哪一运动或哪一政党，哪一领导人。特纳长期来寻求所做的一切只是这样一些方法，给三个国家内部的某些组织或个人提供秘密款项或援助。福特总统在1976年签署的一项政府命令中，暗杀方法遭到禁止。此项禁令后来为卡特所重新确认。特纳完全同意采取暗杀手段，但即使如此，特工人员也总会惧怕他是在把他们引入危险的道路。不管特纳对此作了如何探索考虑，负责行动的副局长总是不置可否。确实，相当数量的钱款正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伊朗国外的反霍梅尼力量那里，但在白宫看来，那只是设计用来惩罚霍梅尼以及伊朗一旦发生反对霍梅尼的革命时便与之建立联系。

特纳还向行动处建议过，让中央情报局制定一个有限度的秘密行动计划以寻求和帮助危地马拉的一些中间政界人员，甚至还可以把一些有希望的危地马拉人纳入中央情报局的薪金发放名单。政治性暴力在危地马拉四处蔓延，这就是典型的中美洲不分胜负的局面：一个右派军人政府对一些左派的马克思主义游击队。在那年，无数的危地马拉人死于战乱。在特纳看来，对处于中间的温和派给以秘密的政治上支持能够给美国利益带来好处，那时正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早在11月14日，特纳把额外观点和私人想法塞进了另一份备忘录中。在“白宫”的题头下，特纳写了“动乱的根源”五个字。这份单子很长，但其中很多问题既有来源于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也有与布热津斯基相呼应的。布热津斯基似乎认为中央情报局是在为他工作。在一个军备控制情报问题上，当特纳不遗余力紧随其后时，布热津斯基告诉他，“你不是最高法院，也不是政府的第四部门，你得决定你是为谁工作。”

布热津斯基喜爱原始情报。国家安全局通过侦听外国通讯，常向他提供一些国家首脑谈话的副本，还有在华盛顿的一些外国使馆发回本国首都的报告。“你看了那份侦听材料没有？”布热津斯基经常这样发问。特纳觉得布热津斯基犯的是典型的高级分析家的错误，相信通过孤立的电文或侦听到的材料就能够解释发生的重大事件。国家安全局录用了一些吹牛的、误听误信而且自以为很重要的官员，抑或获得的是一个报告内容稍多于他所知道的大使的情报，这种情况绝不仅有的，特纳因而在标题为“国家安全局”下面写道：“单一来源的情报分析是危险的。”

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与布热津斯基之间长期存在着一个斗争，后者有时候巧取豪夺。有一次会议上他指责特纳的高级副手说：“你们竟然没有在苏联弄到一个重要人物。”事实上，特纳发展过几个苏联重要人物，虽然特纳确信忠诚的只有一名，二名已经失踪，或许已被害，究竟是失踪还是被害，特纳还未能搞清楚。

于1977年开始的每周三次由特纳向总统作情报简要汇报会议已削减为每周一次，然后又削减为每二周一次。特纳将

这件事的责任归咎到布热津斯基的头上，因为布热津斯基曾经提出一个意见，认为他早知那些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们已经证实他们的分析要比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准确。

1979年伊朗国王来到美国作医学治疗时，即美国人质被扣押在德黑兰两个星期后，白宫要求中央情报局在已被废黜的伊朗统治者的医院病房里安装窃听设备，窥察这位性情无常、已被癌症击倒的人物的举动。特纳争辩说国王享有美国公民的同样权力，而且依照法律，中央情报局不允许在美国国内收集情报。但最后特纳收到了一纸指令，只好忍气吞声，批准在纽约市医院第十七层楼上国王的三个私人病房内使用电子监视侦察。但他始终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认为情报机构只是一种工具，就跟抽水马桶一样。一旦它没有工作，没有把“窃听设备”迅速安装到位，或者当中央情报局未能预见未来，那么它应该受到严厉惩罚。特纳时而迷糊时而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论是在中央情报局里还是在他为之服务的总统那里都是孤立的。

为了试图接触当选总统，特纳送了一本他第二件备忘录的副本给一个过渡时期小组的成员。当时该小组正在为新的一届政府考虑中央情报局的问题。这份副本在一些建议下面用铅笔作了标记，这些建议要求把中央情报局迅速转变成对于苏联的分析和秘密行动的重要部门。结果副本给退了回来。

最秘密的行动之一是SNCP，特别海军控制计划，即所谓的“特别海军”。在这项计划中，美国潜艇跟踪苏联潜艇，还进行非常危险的监视，围绕苏联进行情报收集，有时进入苏联水域或苏联港口，它的活动包括设置高精尖电子录音设

备，称作“豆荚”，是把通信电路搭在一批关键的苏联海底电缆上，这些可能是所有情报工作中最秘密的行动。他们拿船上的所有人冒险，把潜艇、潜艇全体人员以及派遣的一个国家安全局小组投入危险之中。海军却为此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喜爱敢于开拓的勇者。每项使命都得由总统批准。一艘核潜艇出海，放置搭线荚，留在那片海域等上几个星期，直到再进去从已安搭在海底电缆上的录音器中取回录音带。然后录音带得带回交给国家安全局，从中只有个别资料送交给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白宫。特纳有时候觉得这些资料在形势危险时才具有有一点利用价值。

他也承认潜艇也有大获丰收的时候，带回来丰富的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数据。在微不足道的几次行动中，偶而一次获得大量的高质量情报。有时，“窃听”包括苏联官员的相互谈话，从中透露出他们的变化、谎言和弱点。有如许多成功的谍报行动，这机会来自于对方的错误。苏联人曾以为这些海底电缆不可能搭线窃听，因此通讯联系采用比较普通的密码系统，甚至有时候根本就不用密码。

另一个项目是“英迪哥”，一种正在发展的新式绝密卫星系统，该系统有可能成为将来核实与苏联签订军备控制协议的关键。通过采用雷达图像，“英迪哥”能穿透密布的云层并能在夜间工作。而摄像卫星在有云的时候以及夜间就成了瞎子。这种卫星系统的作用在东欧部分尤其重要，在那里，所谓“守护神的云罩”往往持续几天甚至几周。

在国外的一些最卓有成效的情报收集行动是由特别收集分队进行的。这种分队都是精锐的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小组，他们在许多外国首都用最新式的设备实施窃听行动。

特别收集分队能够完成奇迹般的谍报任务，把欧洲、中东和亚洲国家的高级政府会议的文件副本以及关键的政治人物之间的电话谈话逐字地发送回来，为那些普通中央情报局人员在美国大使馆里进行侦听的内容作补充。

由于受到伊朗革命的冲击，特纳试图扩大在外国政府和外国情报部门的雇佣特工网，包括在一些盟国和朋友中。埃及就是一个例子，在埃及有一项中央情报局的安全行动，计划为萨达特总统提供警卫，一俟有军事政变或暗杀兆头就发出警告，同时这项行动允许中央情报局的电子设备和人员进入埃及政府、社会 and 领导人。萨达特吸食毒品而且急于攻击，但特纳对于这种宫帷内的流言蜚语从不关心。然而，中央情报局极有可能被萨达特或埃及发生的事情感到惊骇。这个地方已经在燃烧。

第一章

新局长上任

凯西并不想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真正想当的是国务卿或国防部长，因为国务院与国防部举足轻重，人们完全可以合乎情理地预料：这两个部门将成为里根新外交政策和新军事政策的工具。但凯西也懂得兴许他应该少指望一点或者一无所求才行。因为新当选的总统在加利福尼亚的亲信们很显然会占压倒优势，而他并不是这其中的一员。参加里根的竞选活动他本来就已姗姗来迟，他最后担任竞选总管——至少在名义上是被提升的，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偶然。他还没有成为一名长期的矢志不移的里根派人物。

大选前一个月，凯西预料到里根会获胜，组织了一个不起眼的临时外交政策顾问委员会，共挑选了17名高级专家，包括前总统福特及共和党和民主党中立场明确、引人注目的高级人物。他主持该小组的活动，负责签阅文件和研究报告。有些人觉得他把自己放到强有力的国务卿那样的中心位置上去了。1973年至1974年，他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国务卿，专门负责经济问题。后来被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排挤出来。凯西在基辛格心目中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在基辛格长达2690页的两卷集回忆录里，只被马马虎虎带了几笔。但他还是启用基辛格到里根的顾问委员会。

该委员会认定即将执政的政府正面临一场直接而且关系重大的挑战，这就是在中美洲一个小国家发生的共产主义暴动。凯西判定萨尔瓦多作为一种象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如果美国对于其后院的恐吓束手无策，里根在世界其它地方的信用差距就将面临危险。中央情报局为了省钱在1973年关闭了在萨尔瓦多的情报站，直到1978年才重新开放。凯西得知这一情况时，惊得目瞪口呆。这可留下了五年的间隙呀！怎么可能的呢？中央情报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报机构应该是防御的第一线，但若不去努力获取情报，那它无论在防御还是在进攻中都毫无作用。

11月20日，特纳举行了简况介绍会。次日里根飞回加州。在里根等候就职期间，里根行政当局的中心位置都在供人竞购。谁都知道这是他在加州和其它地方的那些保守派亲信们的事。他们替里根安排了接受一个国外要人的来访，这就是亚历山大·德·马伦歇上校，法国秘密警察头目。该组织相当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在欧洲保守派圈子里，马伦歇是个知名人物。他身高体魁，留着小胡子，夫人是美国人。马伦歇领导秘密警察已有十年。秘密警察绰号叫“游泳池”，因为它的总部设在巴黎郊外的图雷勒游泳池附近。该组织在法国的国内政治舞台上一直是个严肃的角色。在马伦歇的办公室里有一张世界地图，上面用红色标明共产主义蔓延的范围。凡官方来访者都能免费得到这张地图的缩小版。几年前，法美两国情报机关首脑举行官方联络会议时，他曾送过这样一张地图给特纳海军上将。

马伦歇在去加州的途中主动提供的不仅仅是张彩色地图。对法国官方来说，间谍是个很严肃的职业，从事这项工

作要冒极大的危险，同时也能获得可观的回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惯于利用外交官身份将情报人员隐藏在驻外使馆中，对这种做法马伦歇并不恭维，因为中央情报局各情报站的头头以及高级军官们的真实身份——这些人通常全都是中央情报局的军官——都是一目了然的，这对他们的间谍活动正好是一个讽刺。伪装成飞机商或完全不介入社交的身份虽说比较难，但效果会更好。真正的间谍必然彻头彻尾加以掩饰，这是种劳神费力的职业。欧洲情报机关时常利用记者身份来掩盖自己的间谍活动，美国却避免这样做，因为他们把言论自由看得比国家安全更有价值。在马伦歇眼里，假装成外交官的间谍不过是伪君子。

马伦歇给新当选的总统谈了双方共同关心的一些保守原则，如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军事弱点造成的危险以及情报问题。但他始终只就一般话题在谈话。

“你不打算给我提些建议吗？”里根问道，“人人都给我提建议的呀！”

“我只能给你讲讲人。”马伦歇回答说。（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因为他坚信掌握几种语言是情报官员必不可少的本领。）他只能给新当选的总统讲讲“你应该见和不应该见的人。”

“我该见谁呢？”

马伦歇提到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这人深知苏联一切弊端的本质。还有乔纳斯里·萨蕴比里根也该见见，这人是安哥拉抵抗力量领导人。安哥拉位于西南非洲要冲，萨蕴比正在那里与共产主义政权进行战斗。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暗地里向萨蕴比提供过援助，但国会在1976年通过了禁止

在安哥拉进行秘密活动的所谓克拉克修正案后，这项援助被中断了。

“你想了解地狱，就得与到过那儿的人谈谈。”这位法国情报首脑宣称。

“那么哪些人我不该见呢？”里根问。

“有许多人。”马伦歇说，“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可以代表所有这些人的人——阿曼德·哈默”。哈默是西方石油公司的主席，长期以来与苏联许多领导人过往甚密。他是国际关系缓和的象征。

“真滑稽，”里根说，“我常见到他哩。每次我去理发店，他都在那儿。”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马伦歇说。

哈默最近提出了一项长期有效的要求：每次里根安排到贝弗利山的德拉克理发店理发时，哈默都指定要坐里根的邻座。

马伦歇又想到了一点。“别相信中央情报局。这些人都是不认真的人”。这位法国情报机关首脑并不是指中央情报局内藏异己或纪律松懈，也不是指它向报界走漏消息。他指的是这个机构缺乏目的性。

里根向乔治·布什重复了马伦歇的警告——“不要相信中央情报局。”布什曾在1976年至1977年担任过中央情报局长，他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但这句话给里根留下的印象显然始终很深。布什已给他的一位中央情报局的朋友说过，里根假若惯于独立行事，不熟悉情报方面的事情，就应该有一个他感到可以亲近，可以完全信任的人作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特别是在关于目的性的问题上，这很重要。现在，有了马伦